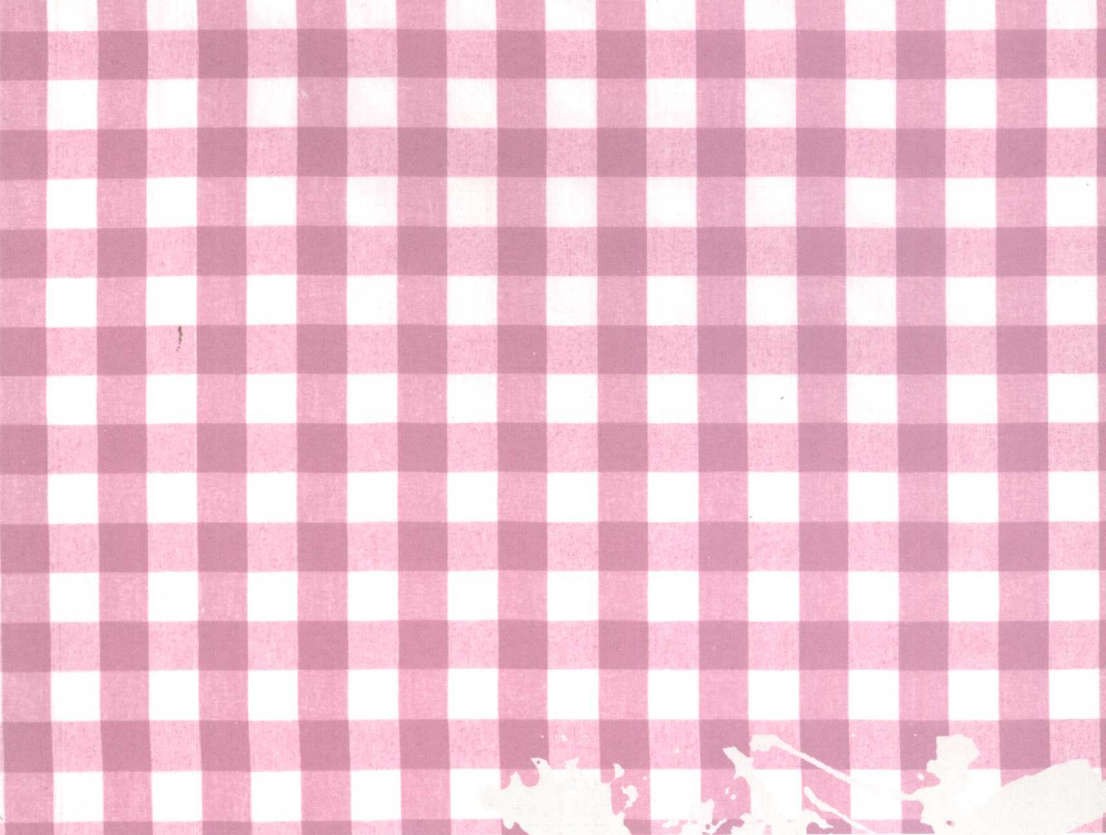




学术大厦也是一砖一瓦建构而成。《砖瓦的碎影》(增订本)展示了作者近20年来学术道路的足迹,是作者学术道路一次反思性的总结,展示了作者研究中国新文学、上海文学文化等领域的致思框架和治学风格。虽然,每篇论文多生发于问题意识,但方法自觉和整体视野仍然非常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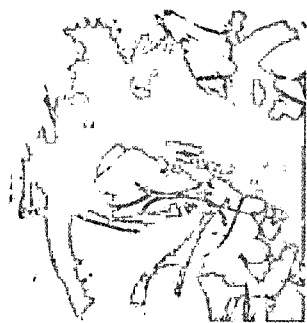
同济·汉语叙事文学丛书

砖瓦的碎影 (增订本)

Zhuanwa de suiying

黄昌勇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同济·汉语叙事文学丛书

砖瓦的碎影

(增订本)

Zhuanwa de suiying

黄昌勇 著

同济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砖瓦的碎影/黄昌勇著. —增订本. —上海:同济大学出版社,2008.7

(同济·汉语叙事文学丛书/王鸿生,马原主编)

ISBN 978-7-5608-3801-4

I. 砖… II. 黄… III. ①现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②当代文学—文学研究—中国—文集 IV. I206.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91691 号

同济·汉语叙事文学丛书

砖瓦的碎影(增订本)

黄昌勇 著

责任编辑 方红玫

责任校对 杨江淮

封面设计 张志全

出版发行 同济大学出版社 www.tongjipress.com.cn

(地址:上海市四平路 1239 号 邮编:200092 电话:021-65985622)

经 销 全国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江苏句容排印厂

开 本 890mm×1240mm 1/32

印 张 11.25

印 数 1—3100

字 数 302000

版 次 2008 年 7 月第 1 版 2008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608-3801-4/I·77

定 价 23.00 元

本书若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主 编 王鸿生 马 原

执行主编 郭春林

编 委 (按姓氏笔画为序)

马 原 万 燕 王鸿生 王晓渔 叶 凯

朱大可 朱崇志 朱静宇 刘 强 孙宜学

李 弢 应宇力 汤惟杰 张 生 张 闳

张 念 张屏瑾 周 茜 柳 珊 钱 虹

郭春林 崔 铭 黄凤祝 黄昌勇 黄春燕

喻大翔

总 序

近半个世纪的世界考古学研究表明,东西方古代文明的衍化过程具有相似性。然而,世界上还没有一个这样悠久的巨大文明体能像中国这样历经变革而延续不断。东部面向海洋,西部面向欧亚大陆,此种人文地理特征,不仅在黄河、长江流域发展中国古代文明创造了基本的环境和条件,也为中国与世界大陆文化与海洋文化的连接提供了相应的可能。

当然,中华文明之聚合力 and 绵延性的形成,既与“书同文”即汉语言文字的高度统一有关,又与“史传百姓与知”的文教浸淫传统密不可分。诚如晚清章太炎指出,“国之有史久远,则亡灭之难”,而“史之所记,大者为春秋,细者为小说”,“传固有载故事者也”。以此亦可见,“史”、“传”虽为汉语叙事的原初样式,但其中早已埋下了小说、故事、神话的连体因子。中国文学史上的叙事经典,像《史记》、《山海经》、《聊斋志异》、《红楼梦》等等,经世代披阅、口耳相传,无疑对民族精神的形塑和汉语智慧的传承起到了无可比拟的作用。

值得一说的是,汉语世界向来注重叙事活动的价值奠基作用。在甲骨文里,“叙”为形声字,以又(手)为形,余为声,本义即指排列

出高下和先后的次第;用作名词,如《尚书·洪范》“五者来备,各以其叙”,指的是次序、秩序;用作动词,如《周礼·天官·司书》“以叙其财”,指的是排顺序;而《国语·晋语》“纪言以叙之,述意以导之”,其意则为陈述、记述。诚如当代法国思想家 Paul Ricoeur 反复阐释的,叙述过程所带来的秩序或者统一性、连续性,实际上正是整个价值世界的基础。

强调叙事活动与价值世界的内在关联,在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的近世,尤具深意和针对性。20 世纪以来,“兽栏”(尼采)、“城堡”(卡夫卡)、“铁屋子”(鲁迅)、“深渊”(海德格尔)、“荒原”(艾略特)、“监狱”(福柯)等空间意象,均传达了中西哲人对世界精神状况的危机感受;尤其在当下,“诸神之争”不息,“消费社会”兴起,电子经验已开始取代人们的自然经验——面对现代、后现代的诸多价值困惑,我们当如何作出回应,如何激活自身的经验和叙事资源,并促成新的可能性领域的开放,还有赖于人文学界长期而艰难的努力。

自本根基而不泥古,广采西学而不崇洋。本着这一文化自觉态度和文化开放精神,我们特设“同济·汉语叙事文学丛书”,以吸纳新思、交流才艺,展示汉语叙事文学(创作与研究)的创造性成果,并为促进当代中国文学与文化的发展尽绵薄之力。同济者,同舟共济也。以此,我们将视“丛书”为天下公器,诚望海内外同道伸出援手,参赞其事,共同来见证一个时代的文学步履。

王鸿生

2007 年夏于沪上同济大学

原版序言

陈鸣树 符杰祥

距学界反响甚大的《王实味传》问世仅时隔两年,昌勇君的新著《砖瓦的碎影》又即付梓,不胜欣然。这并不仅仅是因为由此所示的作者著述的丰厚和学术的胜绩,同时也因对其书的一分了解,而知悉其人之于治学一贯的勤苦与谨实。实际上,在他的心目中,这部书的分量也许甚至更重。与披沥十年之艰而博得学界赞誉的《王实味传》相较,这部收录其治学精要的文集,不仅耗费心血更多,而且更完整、更全般地显示出了作者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致思框架与治学风格。因而,《砖瓦的碎影》既是其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的经年累积,同时也是对他自己近年来学术研究的一个反顾性的总结,自然有可值得珍重与感念的别一种意义在。

鲁迅在为孔另境编《当代文人尺牋钞》做序时曾云,尺牋最能“知道这人的全般”和“真实”。对于学者个人来说,专题著述固然可以更明了自己的修业方向和学术思想,但若兼收“知人论世”的“尺牋”之效,最有效的方法还是阅读作者的文集。从最初的左翼文学,到后来的新月派,以至近来的现代思想史与知识分子研究,《砖瓦

的碎影》一书实际上主要辑录了作者在中国现代文学方面步步深入的探求与思考,其中的执著与努力是显而易见的。昌勇君的治学一如他的做人,北方人那种朴实、谨严的性情亦深藏文中。在普遍浮躁的学界,这种用力甚勤而不刻意追求速成的坚持殊为不易。时下,有关学术评议与体制的讨论越热烈,也越能暴露问题的严重性。片面追求量化不仅制造大量品质恶劣的学术泡沫和虚假的繁荣,更严重的后果是,它使得学术体制在量化指标的压力下日益僵化,从而丧失学科自身机制的活力与大度。对于学界中任何人来说,追求“速效”的学术风习造成的恶性循环都会直接影响到自身,无论是作为一种奖励的诱惑,还是作为一种褊狭的压迫。在这种情势下,昌勇君能坚执自己的学术信念,恪守“板凳要坐十年冷”的古训,唯精唯一,孜孜以求,取得实绩,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为自己这部中国现代文学论集题名为《砖瓦的碎影》,可以看出昌勇君一贯的谨严和谨慎,但从文中广泛涉猎的专题看,我们仍然不难发现作者在这一领域企图进行整合的努力与宏心。本书收录的文章主要涉及他左翼文学和新月派等方面的研究。左翼文学和新月派分别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思潮现象,可谓“双峰并峙,二水分流”,基本上标示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构架。之所以精心挑选出这两大学术板块来作为自己建设现代文学研究的“砖瓦”,其高屋建瓴式的整体规划宏图其实从一开始就了然于胸次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自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就开始了一种自我反思的潮流,比如“重写文学史”、“20世纪中国文学”的呼吁与提出,就显示出了一种脱离意识形态教化,回归本体与重新定义

文学史的自觉和努力。在延伸、拓展现代文学史时间与空间双重维度的意义上,《砖瓦的碎影》也明显地表露出这一丰富的历史痕迹。解构旧史是文学史解放自身的一个必要的前提,但问题更在于,如何在重新解释文学的过程中来建构新的史学景观。相较于理论的争鸣,实践的问题是更具体,也是更为烦难的。正是在这一点上,作者表现出了自己独特而深刻的学术识见。与许多急于以另一种“宏大叙事”的形式来重新建构历史者不同,作者选择了以论构史的稳健方式。在本书的构架中,作者有目的地选择了激进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相互对立的文学现象,从共时性的角度构成了对中国现代文学史的整体叙事的趋势,但同时,作者又不急于求成,而是从“左联”和新月派这两大代表性的具体现象入手,展开一步步的论述。在论述中,作者既注意到了对文学思潮流派生成与演变进行历史性的考辨与描述,也注意从作家、作品、文学理论的具体论析来展开说明与论证。正因为本书注意从论述这种“砖瓦”性质的建基工作入手,又注意在其中涵贯史的整体视野与气度,因而,宏观与微观、历时与共时的史论结合,就使得本书在微观的论学中不失之于“一叶障目”,宏观的衡史也祛除了渺远空疏之弊。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给自己的中国现代文学论集取名为“砖瓦的碎影”,虽然有示以谦虚之意,倒是在一贯沉稳的风格中,较为恰切地呈现出了自己的治学思路和实绩。作者取名如此,我想这也许是深意之一端吧。

维柯在其《新科学》中提出“寻找真正的荷马”,日本思想界在明治时期提出“回到福泽谕吉”,卢卡契、阿尔都塞等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提出“回到马克思”,这些在不同地域

与时期发出的相互一致的声音,来源于思想者寻求真理的本源性冲动。和所有的人文学科一样,真理的绝对命令决定了被历史所规定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同样是一个被历史反复阐释而永远不可能穷尽的过程。所以,有学者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的“回到鲁迅那里去”,是绝非偶然的极富隐喻意义的事件。重新发掘、寻找与阐释过去被人为扭曲、删改、掩埋的历史,在为意识形态服务的烙印最深的中国现代文学界,释放压抑的热情是可想而知的,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方法热、观念热,以至随后而来的沈从文热、张爱玲热便是其中的几例。

心灵自由作为文学批评最高理念的“道”,不可能被暂时之“势”永远禁封和抑制。因而,重写文学史的热情是历史的必然所促成的,但对于作为学科的文学研究来说,清明的理性与自由之心灵同样重要。重写文学史,不仅意味着对作为事件的历史的重新认知,而且意味着对既成文学史的整体反思。遗憾的是,关于学科自身的整体反思意识在重新修史的热潮中并不够自觉和清晰,因此又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沈从文、张爱玲等一批过去被沉埋的作家成为新的热点,过去所哄抬为“主流”的左翼文学却异常冷落。这其中也许有卢卡契所说的一种需要否定的过程性,但问题并不止于此。实际上,许多披以文学性之名的“本体”研究,并没有真正回到文学研究的内在本原上来。重写文学史固然不是对旧版文学地图的修修补补,但也不是对客观史实的颠覆与背离。事实上,作为影响深远的事件,左翼文学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个有机部分,不可能被生生剥离;而左翼文学研究过去貌似高扬,实则

也已沦为政治权威的运作,与其他文学现象的遭遇实质上是相同的,同样需要从文学性原则进行重新审视与反思。在以往的意识形态批评话语中,左翼文学自身丰富、复杂的诗性蕴含与精神蕴含同样存在着被政治视野所取替、遮蔽的问题。因而,文学史多元空间的开创,关键在于对此类问题的追问与清理,而非冷冷热热的颠覆与置换。将过往之罪责归于左翼文学,本已大谬;而以文学性回归的名义再行废立之事,与自己所质疑的政治批评一样,同入二元思维的陷阱,则更为可悲。

没有整体视野,即或舶来形形色色的新观念与新方法,文学史的书写也会是支离破碎,不可能在内在精神意义上形成真正的打通。《砖瓦的碎影》意义在于,在顾此失彼的“重写”热潮中,作者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问题的症结所在,从而有了一种书写文学史所应有的理性自觉。与许多追逐热点的学者不同的是,作者首先从问题最多的左翼文学入手,开始自己的清理与研究。这并不是说,作者缺乏庄子所云的“与时俱化”的敏感,实际上,他在后来的对新月派及对梁实秋等人的研究,成绩同样非常出色。比如他论新月派的文章,就在《文学评论》等学术期刊被连续刊载,继而又被转载,影响甚大。对被人轻忽的左翼文学的史学意义的充分重视与再发现,正可以见出作者识见的深刻:如果趋热一时,不从最基本的问题入手,文学史的研究就难免于聚沙建塔,空中造屋,行而不远。他在《左翼文学、左联文学及其他》一文中对重视左翼文学研究的呼吁,就充分标明了这种意识的清醒与自觉:“左翼文学作为 20 世纪中国重大的政治-文学事件,它给我们文学研究者带来无限的研究空间,有不少重大的命题需要

探讨,而且这些命题的研究水准的高低直接影响着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完整、准确的阐发。”反观学界,迟至近年方才恍然醒悟,认识到左翼文学需要重新研究的意义,因之陆续有一些新的论著问世。可以说,昌勇君是以自己的沉稳、扎实和谨严而反得先声的。在这一方面,书写文学史的教训确实值得反思,我们也希望左翼文学研究不会再成为遮蔽其他文学现象的新的“热点”,重蹈昌勇君所批评的“见木不见林”的顾此失彼的覆辙。

对于现代文学史来说,更新观念、话语与方法当然是有益的,但并不是最重要和最根本的问题。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20世纪80年代初方借“解放”东风、始思“革新”的研究界,境况一仍如鲁迅所云的“近世”之旧:“稍稍耳新学之语,则亦引以为愧,翻然思变,言非同西方之理弗道,事非合西方之术弗行。”一度引发轰动的观念热、方法热再次印证了“文化偏至”的历史必然性。外来思潮对现代文学封闭格局的冲决和研究视界的拓展,其意义无可怀疑。但是,如果不在根本问题上用心,仅靠移植新说,理论与思想的深度问题亦难解决。文学研究后来曾一度引借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等自然学科的理论方法来开辟新境,探索实验之功自不可没,但除了说明文学研究的创新在只能借助于追新逐后的歧路上渐行渐远而日见窘态与疲态之外,还能说明什么呢?现代文学研究要“返其根本”,就必须回到对自身以及学科的反思上来。在这一问题上,昌勇君追索问题的恒毅和治学品性的谨实,无疑使他显示出了与众不同的卓识。在他看来,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研究的观念与方法的匮乏,而在于制约如何研究的学科原则与规范。只有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学科有了清晰的认

知,理论创新才能真正具有意义。《左翼文学、左联文学及其他》一文是以左翼文学研究为具体探讨对象的,但实际上,这篇文章以左翼文学研究为例,涉及对中国现代文学学科的整体现象的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近年来备受质疑,除了其历史的短暂性和意识形态的干扰,自身的建设方面也难辞其咎。作者不无忧虑地看到,其他人文学科“对中国现代文学整个学科建设的科学性也不同程度地持有偏见”,但他对种种“偏见”并没有作以简单驳斥。在强调了现代文学的学科价值与意义不应忽视的同时,作者也指出了中国现代文学在学科建设上的内在缺失:缺乏如古典文学、历史学那样严备的学术规范。他认为,“以论代史、为我所用、不断翻新理论的所谓宏观研究”之所以“成为近年来的主流研究形态”,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史料建设”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在“总体上缺乏那种为史料而史料的学术态度,这一点与国内古典文学的研究、海外尤其是日本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比较还有相当的距离”,确是一个可叹的事实。学界所谓“思想性大于学术性”的讥诮之语,其实指的就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对于史料考证这类基本的治学功夫的轻忽。阮元谈及治小学的重要性时曾云:“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同样,没有坚实、严格的学术训练与规范,所谓的思想性也不过是非伪即歧的,很难有大的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作者指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常常“将文学评价与文学史评价混同”,引起“价值判断失范”、意见歧出现象也是必然的。意见歧出的混乱往往借以学术争鸣的名号,实质上是史学视野与规范的阙如。也许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学科建设的历史相对短促,学界于此尚乏足够的理论自

觉。在标新立异的喧闹中,作者能坚持史、论之辨,从各色好看的麒麟皮下识出荒陋的马脚,发现问题的症结,的确给人一种豁然开朗、耳目一新的感觉。

学术规范与史学建设的呼吁,是昌勇君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积弊感同身受的锥心反思,也是他多年来所致力思考的问题核心。作为经年积累的总汇,《砖瓦的碎影》显然最能反映他在这一方面的用心之处,也最能见出他爬梳史料的扎实的考证功夫。其实,20世纪90年代开始,昌勇君就不断地在《新文学史料》发表挖掘考辨史料的长篇文章。当然,学术上的创新、识见与思想历来为学人所重视,正如章学诚在《文史通议》一书中所云,“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不过,“识”之所出,源于“征实”。其实,“征实”对学者的要求之艰之巨,绝非仅凭附会新说者所能及,而学识之深浅有无,从是否具备广博的学术积累、洞幽烛微的辨史能力方面,亦可一望而知。本书许多独特、精辟的创新之见,就是得益于作者锲而不舍、厚积薄发的学术积累,非一日之寒所能为。《五四文学思潮中的重要一翼》与《新月派史略》、《新月诗派论》等几篇文章,涉及的都是思潮流派一类的宏观研究。宏观意味着研究对象的庞大和历史景象的芜杂,因此它首先要求研究者对历史资料具有完备积累和充分掌握。也就是说,只有在“知”之淹博的基础上,方能辨伪识真,披沙拣金,得“识”之宏通。对于历史记忆,后人往往好作大语,惯于以某种先验理念剪裁历史,昌勇君的宏大叙事却是从细微的史料考辨入手,力图还原历史深处的丰富与复杂性,所以能一去空疏与简化之弊,别出新见而又不失谨实。左翼文学思潮因为1928年的论争

风波而引起注意,所以,此一阶段的文学现象备受关注,但左翼文学思潮如何发生而发展的源流与演变过程,后世学者却多语焉不详,缺乏考据。《五四文学思潮中的重要一翼》就是出于此虑,将马克思主义所影响形成的文学传统一直追溯到五四时期,并从理论背景、思想渊源、文学影响等方面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探析,令人信服地提出了革命文学“内生长性”的论断。文学史研究要以“对文学史料进行充分全面考察”为基础的理论意识,在作者此后的新月派研究中,更为成熟和自觉。新月派的人事聚散、刊物兴衰、思潮流变更为复杂,兼之过去非系“显学”,所以这方面的研究于学术创新虽富有意义,于旧史搜辑却也更为艰难。可幸的是,作者并不畏考证之繁琐,不惜以繁复的笔墨,对其胚胎、形成、发展、分化的历史行迹作了极为细致、广泛的描述与论证。正是因为不厌琐细的扎实考辨,作者的行文方显得从容自如,游刃有余,精辟之见亦若随处珠玑。在相关的系列研究中,他超越了将新月派作为一个格律诗派的局限,认证其是一个综合性的文化流派,从而获得了对其内蕴的深切理解。比如,新月派理论与五四文化精神的深刻联系、后期新月诗派概念的提出、新月派人性论文学思想以及与鲁迅论战的合于事实而又精微的阐发、对“健康”、“尊严”的重新诠释等,剖微抉幽,新意迭出,解决了困扰文学史研究的几个难题,意义甚殊。由此看来,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创新倘若缺乏扎实、严谨的治史功夫,思维的超越性也同样难以实现。

以砖瓦为基来整合历史碎影的理论自觉,备显作者治史方面的谨严与优长;又因为从细微处着笔,所以在文学文本的解读方面,同

时也不失灵动与颖悟的一面。对于文学艺术来说,心之同情与感悟尤为重要。文学作为安妥人类心灵、感发思想的精神牧地,诗性与人性自然是其内在本属。因而,心之同情与感悟,实际上就是对于这一文学本性的理解与阐发。左翼文学因为自身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致使过去的研究往往假借“文学”名号,实则完全沦为政治批评。文学史研究在史的意义上,自然应该正视这一特殊的文学现象,但问题是,左翼文学作为文学,其文学性的研究也至为重要。多年来的政治批评话语对于其相互粘附的诗性、人性一面的态度始终是暧昧、含混,甚至视而不见的。实际上,这种长期以来被狭隘的文学史观所遮蔽的现象的确是一种可证的史实。为此,左翼文学研究一方面必须正视、不能随意剥离其意识形态色彩;一方面又必须摆脱政治批判这种单一视角的缠绕,回归到文学性的原则上来。研究什么对象并不等于拘守、认同什么问题。然而,学界在这一方面似乎一直存在着将“同情”视为“认同”的误识。因此,曾一度将更迫切需要回归、重写的左翼文学研究摒弃于研究视野之外的现象,同样缺乏研究应有之“同情”。在强调左翼文学的史学意义的同时,作者提出左翼文学应具有“理论上的新的研究视野”、作为文学的“表现内涵远比政治观念丰富得多”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出于文学研究的一种特有的“同情”或敏感。

事实上,左翼文学作为其时所盛行的前卫性的思潮,与各种现代文学思潮有着内在联系。而许多左翼作家在从事文学创作的初始,就曾披沥过五四以来各种新思潮的洗礼,正如美国学者 P. G. 匹柯维茨所指出的,许多文人“断然决定走革命的道路,但他们受到自由主

义理想的鼓舞,或许要多于学究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但是,在既往文学史中,左翼文学与其他文学思潮、左翼作家与文学创作的复杂联系,却被意识形态所规定的问题框架所深深遮蔽。本书立足于扎实的史料考证,而时有不为某种理念所限的精彩发挥与发现,正是出于对文学精神复杂性的那种殊为可贵的敏悟。《被遗忘的20年代乡土作家》等文就是通过文本的精细解读,而遂有祛除遮蔽的惊人新见的。比如,作者提出左翼青年作家胡也频系20年代典型的乡土文学作家的论断,迄今尚未有人涉及。《丁玲创作中的重要里程》通过对《韦护》与《莎菲女士的日记》的比较,《韦护》修改本与初版本的比较,在细致的文本分析中发现了《韦护》与前期创作内在的精神联系,从而对研究界此前一直坚持的“革命加恋爱”模式的“失败说”进行了有力的反驳。《预言与危机:冯雪峰的丁玲论》则是别出心裁,从冯雪峰有关丁玲创作的具体评论入手,兼比照于丁玲的创作实际,来论析冯雪峰的文学思想。因而可以说,该书求证于史实,而又不为其所限,史与识相得益彰,就是因为有了一份对于文学的颖悟之心。

为求知而求知是学者探求真理的永恒冲动与本然追求,这种学术本位的独立立场同时也意味着思想的责任与承担。也就是说,为学术而学术是学术钻研应有的态度,但其旨却在思想的深刻开掘,其意却在于独立的思想创造。如果学术追求偃然于寻章摘句,以经院哲学自囿,难以充分、自主地发挥其独特的影响力与思想功能,也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乾嘉考据立义必凭证据,文风朴实简洁,梁启超因而在《清代学术概论》一书中将其称做“为学问而治学问”的“真学